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古汉语语音系的构拟

〔俄〕С.А.斯塔罗思京 著

张兴亚 译

唐作藩 审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古汉语音系的构拟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俄〕С. А. 斯塔罗思京 著
张兴亚 译
唐作藩 审定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2-157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汉语音系的构拟 / (俄) C. A. 斯塔罗思京著; 张兴亚译; 唐作藩审定.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2

(未名译库)

ISBN 978-7-301-21499-2

I. ①古… II. ①斯…②张… III. ①古汉语—音韵学—研究 IV. H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8960 号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Наука”, 1989

书 名: 古汉语音系的构拟

著作责任者: [俄] C. A. 斯塔罗思京 著 张兴亚 译 唐作藩 审定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499-2/H · 31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7.5印张 652千字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大约十年前张兴亚教授就曾对我说,他准备翻译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即今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斯塔罗思京教授(Серг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Старостин,1953—2005)所著《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并见告斯塔罗思京是著名语言学家、汉学家雅洪托夫(С.Е.Яхонтов)先生的高足。我很高兴,希望他们尽快翻译出来,争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因为十多年前即1987年北大出版社曾出版了雅洪托夫先生的《汉语史论集》¹。这不仅为北大师生提供了一本很好的教学参考书,而且事实证明,也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同行特别是不悉俄语的朋友们的欢迎。

雅洪托夫先生对汉语的语音、语法特别是上古汉语的音韵系统有着很深的研究。比如他发现《切韵》音系中二等韵(如“江、皆、佳、夬、肴、删、山、咸、衔、耕、庚二、麻二”)几乎没有以来母为声母的字,而在谐声中,二等字又与来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厯从龙声,埋从里声,彎从巒声,膠从廖声,柳从卯声”。因此他认为二等韵字在上古都曾有一个带[-l]的复辅音声母,如[p^hl-]、[ml-]、[tl-]、[kl-]之类。其中的[l-],也可视为二等韵所特有的介音;正因为已经有了这个[l-]介音,所以二等韵不可能出现来母(后来他把这个介音[-l]构拟为[-r-])。雅洪托夫的这一解释很有见地,因而为不少中外音韵学者所推许,并予接受。如李方桂先生不仅采用[-r-]拟测为喻四的音值,而且作为介音,把它看作是卷舌声母产生的条件。

斯塔罗思京也是现代俄罗斯一位著名汉学家和汉藏语比较语言学家,曾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可惜英年早逝了。他生前发表多种研究汉语史、汉藏语比较和日语语音史的论著,如《关于汉语和汉藏语起源的比较研究》(合著)、《关于古代汉语声调的研究——亚洲语言的谱系、地域与类型联系》、《汉藏语和侗台语》、《原始日语语音系统的构拟》等。《古汉语音系的构拟》是他的一部代表作。这部书共有六章,即“绪论”、“中古音系的构拟”、“上古晚期声母系统的构拟”、“上古汉语起首音系统的构拟”、“上古韵母系统的构拟”、“上古汉语史的语音变化分期”。内容丰富,有不少

¹《汉语史论集》谢·叶·雅洪托夫著,陈重业、顾越、王硕、叶蜚声、杨剑桥、伍铁平、郭力、邱广君、李左丰、刘勋宁、张惠英、张双棣等译校,唐作藩等选编,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 古汉语音系的构拟

自己的创见。

但他的上古汉语音系的构拟工作也是在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1889—1978)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知道,高本汉是将中国传统音韵学科学地系统地引向现代音韵学的第一人(此前有英国人商克和德国人加贝伦兹进行过尝试,但不系统),他首先利用现代方音和域外汉字读音即日本吴音、汉音和朝鲜语、越南语里的汉字读音,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并参照中国古代韵书、韵图等文献资料,构拟出《广韵》音系即中古音系,然后又利用清代古音学家研究《诗经》韵部系统的成果和形声字材料,运用内部拟测法初步构拟出一套上古音韵系统。高本汉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当然任何开创性的工作不可能没有问题。所以在高本汉之后中外许多学者对他的研究或提出质疑或加以补订,例如法国的马伯乐,德国的西门华特,俄国的钢和泰,日本的滕堂明保和中国的钱玄同、林语堂、罗常培、李方桂、王力、魏建功、董同龢、陆志韦、周法高、周祖谟、张世禄等。他们的主要分歧,在古声母方面,如有无复辅音,全浊塞音与塞擦音是否送气,卷舌音何时产生,喻母的音值等;在古韵母方面,每部的主元音只有一个还是有两个以上,二、四等韵有无介音,入声韵尾是否有清浊两套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外又涌现出一批新的古音韵学家,如美国的白保罗、包拟古、罗杰瑞、柯蔚南、张琨夫妇、余霭芹、薛凤生,加拿大的蒲立本、日本的赖维勤、平山久雄、桥本万太郎,苏联的雅洪托夫和中国的严学窘、俞敏、邢公畹、喻世长、黄典诚、王显、邵荣芬、李新魁、何久盈、郑张尚芳、丁邦新、龚煌城、郭锡良、陈新雄等。这些学者除了继续研究讨论以前提出的问题(如有无复辅音)外,进一步开创了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利用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诸语言,运用汉藏语比较研究的成果材料以及梵汉对音以构拟上古汉语音韵系统,并关注中古汉语声调的调值及其上古的来源,比如说去声来自[-s]韵尾;一是声称抛开《切韵》系统,从现代汉语方言入手,即每位学者专注某个大的方言区,通过选择的几个或十几个方言点进行历史比较,构拟出这种“古方言”,如古闽语、古粤语、古吴语、古客家语等等,准备将来在这些古方言的基础上再进行历史比较,以重建所谓“原始汉语”。这些学者又被称为普林斯顿学派。但蒲立本反对这种做法。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又出现新一代古音韵学者,斯塔罗思京就是其中突出者之一,他还有美国的白一平,法国的沙加尔,日本的平田昌司和中国的杨剑桥、尉迟治平、施向东、潘悟云、孙玉文及中国香港的余迺永等。斯塔罗思京非常尊重他的老师雅洪托夫先生。他的著述在其师研究的基础上,并参考了中外音韵学家(如高本汉、蒲立本、王力、董同龢、罗常培、周祖谟、李方桂、李荣等)的研究成果,对汉语的历史特别是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系统的、独创性的研究。《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这部著作就记录了他的研究成果

和创见。例如关于带[-r-]介音的二等韵，他根据梵汉对音材料认为-r-在公元三世纪已脱落，但介音r的脱落并未引起后面长元音的音质发生变化，只是其卷舌特征转移使后面元音发生卷舌化，西晋嵇康诗韵中二等字“怀”与一等字“回、颓、隈、哀”等相押，说明它们的元音音值相同。又如他提出中古“等”的区别来源于上古长短元音的对立，即一、二、四等韵为长元音，三等韵是短元音。斯氏说，这种长短元音的区别曾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但随着长短元音音质上开始产生区别而逐渐分化。他根据罗常培和周祖谟关于两汉韵部研究的成果，认为在东汉诗歌押韵中已能看出这一分化的过程。如东汉歌部中的支韵字转入支部，即是歌部中长元音[a]未改变音质或往后移，而短元音[ɤ]往前移，致使后来在三等韵中分化出一系列前元音或央元音[e][ɛ]等。可见斯塔罗思京既运用现代汉语方言及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材料方法，也很重视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还吸取了研究日语历史语音学的成果，重新探讨，着重构拟了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音韵系统。

斯塔罗思京考虑到汉语历史及其研究根据的特点，他把一般学者所谓的“上古汉语”又细分为六个时期。这就是（1）原始汉语（汉字谐声系产生之前的汉语包括殷商甲骨文时期的一部分，公元前14—11世纪，下限是公元前11世纪），（2）上古汉语早期（汉字谐声系统形成时期，下限是周初），（3）前古典上古汉语（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简称上古汉语），（4）古典上古汉语早期（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5）古典上古汉语晚期（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3世纪初，又可分为西汉与东汉两阶段），（6）后古典上古汉语时期（公元3世纪至5世纪，又可分为初、中、末三阶段）。而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就是中古汉语时期。他这种细致的分期不是凿空或想象的，而主要是根据汉字谐声和历代诗歌韵文的用韵。他曾亲自对《诗经》、《老子》、《荀子》及屈原、宋玉、阮籍、嵇康、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的诗歌韵文的押韵进行了研究，表明他不愿意利用二手材料。他所构拟的上古音即是他所分六个时期中的第3个时期（即西周到东周战国），而和所谓“原始汉语”（即其所分的第1个时期）严格地区分开来，不似某些学者把它们混为一谈。这可以看出他是很慎重、很严谨、很科学的。他构拟中古音时主要参考了李荣的研究成果，即在根据《切韵》—《广韵》音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韵镜》等韵图资料及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的汉字读音。为了构拟“后古典上古汉语时期”（又称上古晚期）的音系，他首先利用现代闽方言构拟出“原始闽语系统”（与罗杰瑞的构拟有所不同），然后与他构拟的中古音系进行历史比较再予以重建。

斯塔罗思京还特别强调：“历史语言学中的构拟通常被理解为：推求无法用书面文献资料证实的语言（或语族）的某些发展阶段状况。然而古汉语从公元前10世纪初起就有书面文献，因此，‘构拟’这个术语用到古汉语就具有了略有不同的另一层含义，即可以说这是古汉语文字符号的语音释读。”这一看法很有见地，很高明。我非常欣赏。我们对斯塔罗思京教授的具体构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汉语上古音的构拟原本是个很复

杂的问题。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

我们向来就欢迎并鼓励对汉语历史音韵学,包括上古汉语甚至原始汉语的音韵系统进行各种探索。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北大给研究生讲授“古音学”时,就曾号召年轻教师和研究生认真学习或翻译蒲立本教授、白一平教授和沙加尔教授等的新著。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但可以开阔眼界、从中受到启发。我们未敢苟同的只是有人对那种正在探索中尚未取得公认的令人信服的“新见”,甚至还明显地存在疵病的新著,就轻易地予以肯定,过分地加以吹捧,甚至把它树立为现时中国音韵学的发展方向或主流;他们对过去前辈的研究成果,乃至整个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包括章黄学派和王力的学说)则一概加以否定。这种言论与做法显然是无视客观事实,对中国语言学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修养,亦无助于语言科学(包括历史音韵学)的健康发展。前几年中外一些学者就这一原则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谁是谁非已非常清楚。(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一本由陈新雄教授和郭锡良教授合编的《中国音韵学方法讨论集》,收集了近几年来两种意见交锋的论文。)当然,这种争论不可能结束,还会继续下去的。真理愈辩愈明。

斯塔罗思京的《古代汉语音系的构拟》,已由张兴亚教授翻译为中文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体现了北大“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传统。张兴亚是北大中文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汉语专业语言学理论专门化毕业的校友,在校学习过俄语,又长期从事古代汉语与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他的翻译工作是严肃、认真的。“绪论”的译文又经过著名俄语专家信德麟教授和通晓俄语的著名理论语言学家伍铁平教授的审订,质量更有保证。我深信斯塔罗思京的《古汉语音系的构拟》这部译著也一定如雅洪托夫先生的《汉语史论集》一样,受到语言学界同行们的欢迎。不幸的是这部书的原作者斯塔罗思京教授于2005年9月因病逝世了,年仅五十有二。我的老朋友雅洪托夫先生肯定非常痛惜。我们都已年逾八旬,雅洪托夫先生比我年长仅半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心情是可以想象的。这部译著在中国问世,既是对斯塔罗思京教授最好的纪念,也能给雅洪托夫先生一些安慰。

唐作藩

2012年8月于北京蓝旗营小区

作者简介和内容提要

谢尔盖·阿纳托利耶维奇·斯塔罗思京《古汉语音系的构拟》(Серг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Старостин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1989)。作者的老师、俄国著名汉学家雅洪托夫(С. Е. Яхонтов)担任该书审定。С. А. 斯塔罗思京生于1953年3月,卒于2005年9月30日,莫斯科人,俄国著名汉学家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曾任俄国国立人文大学教授、科学院通讯院士、远东研究所历史比较语言学室主任等。他著述颇丰:《原始日语语音系统的构拟》(1975)、《汉语和藏语起源的比较研究》(1977)、《上古汉语的声调研究——亚洲语言的谱系、地域和类型联系》(1983)、《汉藏语和侗台语》(1984)、《北高加索语语源词典》(与尼古拉耶夫合作,1994)、《阿尔泰语系语言语源词典》(主编,2003)等等。《古汉语音系的构拟》是他研究汉语历史音韵学的重要著作。他根据汉字谐声系统和古诗的押韵并结合亲属语言的材料,构拟了公元前10世纪初的上古汉语音系,并对他所划分的上古汉语其他几个时期的音系特点作了分析,对中古汉语音系也重新进行了省视。他的研究继承和发展了乃师雅洪托夫及其他前辈著名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研究尤其是对新材料的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该书正文后附录有作者的上古诗文韵部研究和他构拟的古汉语(上古各时期和中古)音节与诸家所构拟中上古音节的比较表。

绪 论

这部研究著作试图逐次构拟古汉语各阶段的音系。

历史语言学中的构拟通常被理解为：推求无法用书面文献资料证实的语言（或语族）的某些发展阶段的情况。然而古汉语从公元前 10 世纪初起就有书面文献，因此，“构拟”这个术语用到古汉语就具有了略有不同的另一层含义，即可以说这是古汉语文字符号的语音释读。

研究者们构拟公元前 10 世纪初上古汉语的和某些较晚阶段汉语的音系是有文献资料的，但对于更早时期来说就没有了，因此对更早时期便只能使用通常意义上的构拟，即根据汉语本身较晚发展阶段的信息（内部构拟）或亲属语言的信息（外部构拟），作出关于原始汉语音系的总的假说。

古汉语音系的构拟方法

现在语音学家（音韵学家）通过直接观察，就可了解众多汉语方言音系的古老程度明显不同。现代汉语方言（闽语除外）的词汇统计学调查表明，它们是在公元 7 或 8 世纪时分化的。在年代上这个时间跟 6—8 世纪中国政治统一的过程基本一致。

隋唐时代的汉语（6 世纪末—10 世纪初）习称中古汉语，是大多数现代汉语方言的直接源头。那个时期的韵书、韵图流传至今，是用来构拟中古汉语音系的文献资料。

韵书里所有的字依据押韵的原则进行划分。这样，带相同元音、辅音韵尾和声调的字就同属一个韵。每个韵又划分成若干同音字组（小韵），各同音字组内声母必须也相同。《切韵》（公元 601 年）分 193 韵（不计声调区别 58 韵）；《切韵》的增订本《广韵》（公元 1008 年）分 206 韵（不计声调区别 61 韵）。在每个小韵里，任选一个字作为代表置于小韵之首，并给它注上反切。代表字的反切由两个不同的字构成，其中第一个字取声母，第二个字取韵母，二字连读就拼出被切字。由于用反切的方法拼音的汉字数量有限，于是这些字就构成中古汉语一套独特的拼音“字母”。

韵图（所知最早的韵图是《韵镜》，大概成书于公元 8 世纪下半叶）是中古时代语文学家对中古汉语的音节和韵的信息进行分类并使之系统化的一种尝试。在韵图上沿横轴排列

2 古汉语音系的构拟

声母，沿纵轴排列韵。在横行和纵行的交叉点上填上字，该字的读音就是所对应的声母与它所属的韵。韵图体现了中古汉语音节的所有构成成分——声母、介音、韵母和声调的详尽分类。

对中古汉语韵书和韵图的分析，能够使我们区分出中古汉语的全部语音单位，并确定它们的分布关系。但是，要对它们做出语音解释，必须求助于现代方言资料，因为每个现代方言音系都是从中古汉语音系演化出来的。在对中古汉语音系进行语音解读时，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所谓汉日、汉朝、汉越语系统）中古老的汉语借词是弥足珍贵的材料。

在现代汉语方言中闽语处于独特地位。词汇统计学确定，原始闽语是在公元 3—4 世纪时同其他汉语方言分离的。因此，在构拟出原始闽语系统（借助通常的历史比较法），并把它与所构拟的中古汉语系统进行比较后，我们就可以构拟“共同汉语”或上古汉语晚期的语音系统。

然而要构拟更古老的系统，我们就必须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因为，历史比较法通常不允许我们上推得比公元 3 世纪更早，也没有任何更古老时代的韵书或韵图可用。于是，形声字和上古诗歌的押韵，就成为构拟公元前 10 世纪上古汉语语音的基本文献资料。

绝大多数汉字属于形声字。在殷代卜辞中已出现了少量这类字，不过形声字成为汉语音意文字的主体，则是在公元前 10 世纪初期和中期。意音文字的原则是：两个或更多的读音相同的音节（=词，因为在上古汉语中词通常是单音节）能够用相同的字符表示。由数量有限的非派生字（1000 余），构成数量庞大的派生符号，其中非派生符号起表音符号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声符。声符指示字的读音，通常跟由义符表达的字的意思无关^①。声符同由它们所派生的字一起构成“谐声系列”。在上古汉字中“谐声系列”计有一千多个。有关上古形声字信息的主要来源是《说文》（公元 1 世纪），它指出了每个形声字的声符。分析已知谐声系列中的字在较晚时期读音的相互关系，可以找出这些相互关系的某些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可以构拟相应的上古汉字的读音。

通过分析上古诗歌的韵脚，可以把彼此押韵的字（音节）分为若干部——韵部。根据每个韵部里的字在较晚时期读音的相互关系，就可以构拟出相应的上古汉字读音的元音、韵尾辅音及声调（我们这里使用“声调”这个术语是有条件的，因为上古汉语看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声调^②）。

把分析形声字的结果同分析上古韵脚系统的结果结合起来，就能够把公元前 10 世纪初上古汉语的音系相当可靠地构拟出来。

还有一系列辅助性资料：外语译音、汉语辞书、外语借词、亲属语言——可以用来证实并更为准确地断定上古和中古汉语状况的构拟。

称为等韵学的中国传统语文学派，在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研究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由于夏炘、段玉裁等学者的努力，快到 19 世纪时^③，建立在分析上古汉语诗歌基础上的上古汉语韵母分为若干韵部的问题已经基本完成（王力 1935）。但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其实，还有稍后的欧洲和中国的大多数著作）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对上古汉语不同历史时期的押韵特点缺乏应有的重视。

中国传统语文学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研究上古和中古汉语语音的形式方面，即列出音节的彼此对立的各构成成分（声母、介音、韵母，对于上古汉语来说主要是韵母）的类别，几乎完全没有用语音学术语对这些音类从内容上作出诠释。这是因为中国传统语文学普遍具有实用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汉语诗歌的实践和汉字非表音的象形性质所决定的。

上古汉语音系构拟的新阶段业已同欧洲汉学派密切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主要归功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他在许多卓越的著作中，对已经确定的上古汉语的音位区别作出了语音学的解释，并对一系列此前未加区分的上古汉语音位对立提出了区分的根据^④。现在如果不考虑他的著作，就不可能在这一领域进行任何研究。但是高本汉构拟的上古汉语音系，无论是在辅音系统方面，还是在元音系统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高本汉构拟中的许多具体缺点将在下文进行分析）。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的是，高本汉的构拟也基本上没有用外部比较来证明它的正确性，因此，R.Shafer^⑤在其有关汉藏语的著作中（Shafer 1966—1974），宁愿采用用高本汉构拟的中古音，而非他构拟的上古音。后来，许多出版于 60—70 年代的有关上古汉语音系构拟的著作，实质上都是重新诠释高本汉构拟中的某些因某种原因令他们不满意的地方。而这些著作，几乎都没有对尚未发现的上古汉语音位对立进行区分并加以分析的独立研究。在后“高本汉”的著作的大背景下，只有蒲立本和雅洪托夫的著作明显独领风骚，他们的功绩在于发现了许多此前未被发现的上古汉语的音位对立。

笔者在研究日语历史语音学（而这离不开汉语历史语音学的知识）和汉藏语比较语音学的过程中，明显地感到对上古和中古汉语的各种构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拙著是我多年来在这一领域所作研究的总结。谨向 A.M. 卡拉佩季扬茨^⑥、H.H. 科罗特科夫、И.И. 佩罗斯、B.M. 宋采夫、M.B. 索弗罗诺夫表示感谢，他们看了原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译注：

① 原文如此，有误。“字（应改为词）义”并非由义符表示。义符（或作“意符”）通常只是粗疏地表示词所指客观事物所属的大致类别。

② 作者认为上古的声调是伴随性的非音位的，上古没有表示功能的音位声调（参见第四章 2）。作者原注序号用 1、2、3……放在全文末。①、②、③……系译者注，放在章末，下同。

4 古汉语音系的构拟

③ 据王力著《清代古音学》第十章（1992 中华书局）：段玉裁（公元 1735—1815）、夏炘（公元 1789—1871）。夏氏的学术活动主要在 19 世纪。俄语版原文此处是 k XIX B……确切的译文应是“快到 19 世纪时……”也许是由于作者对上述二位学者尤其是对夏氏的生卒年代知之不确，才这样说吧。作者依据的是王力 1935 年《中国音韵学》（1935 商务，1956 年中华书局用商务原纸型再版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该书第三十二节简要介绍了夏氏的古音研究，但未提到他的生卒年代（见该节第 373 页）。

④ 这里译者将“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й”（phonologic）译为“音位的”，也可译为“音韵的”或“语音的”。

⑤ 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1988 年）第 192 页、591 页将这位美国学者注为 R(Robert).Shafer(谢飞)。

⑥ 亚美尼亚籍汉学家，自取中文名“高僻天”。

目 录

序言（唐作藩）	1
绪论	1
第一章 中古汉语音系的构拟	1
第二章 上古汉语晚期声母系统的构拟	25
第三章 上古汉语起首辅音系统的构拟	65
第四章 上古汉语韵母系统的构拟	160
第五章 上古汉语史的语音变化分期	223
附注	262
语言和方言名称汉语拼音略语索引	277
刊物名称略语表	278
文献资料	279
参考书目	280
附录 1 上古诗文韵部	291
附录 2 诸家构拟的古汉语音节比较表	397
译者后记	423

第一章 中古汉语音系的构拟

1. 声母系统

高本汉所构拟的《切韵》声母系统是有充分根据的(Karlgren 1915—1919)。后来许多学者也研究阐释中古(ZH)声母系统,不过,跟高氏的系统比较起来新内容为数不多。

高本汉之后,李荣对这个系统做了最详尽的分析(李 1952^①)。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地方有以下几处:

- (1) 对高本汉构拟的浊送气声母,作出《切韵》时期已经不送气的结论;
- (2) 构拟了高氏缺失的声母 $z[z]$ (俟)(确实,只有很少几个字带这个声母);
- (3) 他把高氏的声母 $\acute{n}z$ [nz] (日)解释为 $\acute{n}[n]$,而高氏 n (泥)和 $\acute{n}$ (娘)的区别被取消(李荣认为高氏构拟的声母 n 和 $\acute{n}$ 本是同一个声母)。
- (4) 构拟 yj - 替代了高氏的起首音 ji -, 因此声母 y (匣)具有完全分布。

同意罗常培和蒲立本的意见(罗 1931b; Pulleyblank 1962 页 69),我们也认为高本汉和李荣构拟的腭化齿音声母 $\acute{t}[t]$ (知)、 $\acute{th}[th]$ (徹)、 $\acute{d}[d]$ (澄), [高氏还有 $\acute{n}[n]$ (娘)], 事实上应是卷舌的 $\acute{t}[t]$ 、 $\acute{th}[th]$ 、 $\acute{d}[d]$ 、 $\acute{n}[n]$ 。在译音里,经常用它们对译印度语的卷舌辅音,就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是这样,李荣提出的 n 和 $\acute{n}$ 合成一个音位就必然不能成立(李不得不那么办,因为不然的话,就有两个彼此毫无区别的腭音 $\acute{n}$)。

中古韵图里的喻母应该仔细研究。这个声母不跟 1、2 等韵母相拼(关于等的区别,见下),它通常只跟 3 等合口韵母相拼,也就是通常带唇介音 w 或出现于唇化元音之前。C.E.雅洪托夫在其前不久的著作中提出,这里喻母拟为 ZH w - (请比较对音:汉日语 w -、汉越语 v -等等。雅洪托夫 1977a)。尽管我们基本上可以接受他这个意见,但这种解释,不能说明某些对音的来历(例如,友——汉越语 hau)和喻母出现于 3 等非唇化音节的情况(虽然这种情况很少)。

李荣和蒲立本认为喻三是匣母(= y)的音位变体。显然,他们这种说法也有自己的理由,不过匣母和喻三的中古发音未必完全相同(否则,韵图和反切都把它们加以区分就难以理解了^②)。我们认为喻三是弱的浊喉音 f 。它跟介音 w 的组合构成音组 fw -, 在这个音组里喉音本身显然是随意的,从发音上看,显然是个 β 类型的音(双唇浊擦音)。八思巴字注音(14 世纪)用 hu -注喻三(音组 hu -在那里标为 u -)也支持这种解释 [Dragunov (龙果夫) 1930]。下面我们将把音组 fw 看成 w , 当喻三后面不跟着介音 w -时,我们写作 f 。

2 古汉语语音系的构拟

喻母还出现在 4^a 等^③，被认为是介音 j-。雅洪托夫在他的书中提出，把这里的喻母重建为 j-（比较这个声母在现代各方言的对音 j-）。八思巴字注音也是用 j 注这个声母的音值的。显然，从中国韵学家的观点看，起首的 j 本是音组 fɿj-。对该声母的这种解释，多半是由于它在中古有强摩擦性质（w 也有类似的强摩擦性，见前文）的缘故。我们赞同雅氏的意见，把出现于 4^a 等的喻母——喻四拟作 j。

我们对高本汉和李荣的拟音系统作了以上一些修改。我们在辅音后用 h 标记送气；塞擦音 ts、ts'、dz 写作 c、ch、ʒ（卷舌塞擦音和腭塞擦音的标音与此相同，但分别带卷舌化和腭化标记）。

于是，我们得到的中古汉语声母系统如下（传统声纽名为译者所加）：

唇音	p 幫	ph 滂	b 並	m 明	w 喻三		
齿塞音和响音	t 端	th 透	d 定	n 泥			
卷舌塞音和响音	t [t] 知	th [th] 徹	ɖ [ɖ] 澄	ɳ [ɳ] 娘			
齿塞擦音和擦音	c [ts] 精	ch [tsh] 清	ʒ [dz] 從		s 心	z 邪	
卷舌塞擦音和擦音	ç [tʃ] 庄	ch [tʃh] 初	ʒ [dz] 崇		ʃ [ʃ] 生	ʒ [ʒ] 侯	
腭音	ç [tʃ] 章	ch [tʃh] 昌	ʃ [dʒ] 禅 ④	ɳ [ɳ] 日	j 喻四	ʃ [ç] 書	ʒ [ʒ] 船 ⑤
软腭音	k 見	kh 溪	g 群	ŋ 疑	x 曉	y 匣	
喉音	ʔ 影					f 喻三	

2. 韵母系统

《切韵》包含一个由 58 个韵（计声调对立 193 韵）构成的系统，也就是彼此能押韵的韵母的部类系统。实际上中古汉语的韵母多于韵（不计声调对立《切韵》可以划分出 105 个韵母）。这说明韵的概念比韵母要宽。一韵之内开口韵母与合口韵母对立，也就是有无唇化介音 w 的韵母对立。此外，一韵之内可以有不同等的韵母的对立，中古音韵学的“等”这个范畴，直到目前还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

《韵镜》的韵图在中古汉语里划分出六类韵母（根据声母在各个韵母的分布情况划分，见下）：I、一等韵母；II、二等韵母；III、三等韵母（李荣的“乙”类—李 1952^⑤）；IV、三等和四等统一的韵母（李荣的：“甲”类）；V、三等和四等双重韵母（李荣的 B 类、A 类）^⑥；VI、四等韵母。

《切韵》每个韵可以包含这六类韵母中的一类或几类。包含 I 类韵母的韵有：冬（-oŋ）²、唐（-âŋ）、登（-əŋ）、覃（-êŋ）、談（-âŋ）、魂（-uən）、痕（-ən）、寒（-ân）、灰（-uêi）、哈（-êi）、泰（-âi）、歌（-â）³、模（-o）、侯（-u）、豪（-âu）。这些韵的所有

* 原书注，见本书“附注”（262—276 页）。

音节都列在韵图的一等。

包含Ⅱ类韵母的韵有：江（-ǎŋ）、耕（-ǣŋ）、咸（-em）、銜（-am）、删（-an）、山（-ǎn）、佳（-ǣ）、皆（-ǣi）、夬（-ai）、肴（-au）。这些韵的所有音节都列在二等。

包含Ⅲ类韵母的韵有：微（-iei）、废（-iei）、殷（-iēn）、文（iuən）、元（-iēn）、嚴（-iēm）、凡（-iuēm）。这些韵的所有音节都列在三等。

包含Ⅳ类韵母的韵有：鍾（-ioŋ）、之（-iə）、鱼（-iǎ）、虞（-io）、陽（-iaŋ）、尤（-iu）、蒸（-iəŋ）、清（-iǎŋ）、幽（iěu）。这些韵的音节常规列在三等；但是，如果音节的声母是咝辅音或 j，它就列在四等，而如果声母是卷舌塞擦音或擦音，那末它就列在二等。清、幽二韵特殊，见下文。

包含Ⅴ类韵母的韵有：支（-ie）、脂（-i）、祭（-iǎi）、真（-ien）⁴、仙（-iǎn）、宵（iǎu）、侵（-iəm）、鹽（-iām）。这些韵里唇牙喉音音节可以列在四等或三等（与李荣的 A、B 类相当）。其他声母等的分布特点跟Ⅳ类韵母相同^⑦。

包含Ⅵ类韵母的韵有：齊（-ei）、先（-en）、萧（-eu）、青（-eŋ）、添（-em）。这些韵的所有音节都列在四等。

有些韵同时包含两类韵母：東（-uŋ、-iuŋ：Ⅰ类和Ⅳ类）；庚（-eŋ、iēŋ：Ⅱ类和Ⅲ类）；麻（-a -ia：Ⅱ类和Ⅳ类）。

我们以表格的形式描述中古声母在各类韵母中的分布情况（在三等韵母类别序号旁引用了李荣的名称）⁵：

表一

声母类型	韵母类别					
	I VI	II	III “乙”	IV “甲”	VA	VB
K、P	+	+	+	+	+	+
C	+	-	-	+	+	-
Č	-	+	-	+	-	+
Ć	-	-	-	+	-	+
T	+	-	-	-	-	-
Ṭ	-	+	-	+	-	+
J	-	-	-	+	+	-

考虑到韵母类别与等的相互关系，这个表格可以转写如下⁶：

表二

声母 类型	等	1、4	2	3	4 ^{a7}
K、P		+	+	+	+
C		+	-	-	+

(续表)

C	-	+	-	-
Ć	-	-	+	-
T	+	-	-	-
Ṭ	-	+	+	-
J	-	-	-	+

现在我们试图从语音学上剖析各类韵母的区别和各等的区别。

按照所有研究者的一致意见，一等无标志；这个等的音节含非前元音和非腭化辅音（由于我们引入元音的松紧特征，因而须补充，一等元音同时还是松元音，参见下文）。

高本汉等主张开元音（高本汉 a、ä[ɛ]、ɛ[æ]、ɐ Karlgren 1954；李荣 a、ä[ɛ] 李 1952；蒲立本 a pulleyblank 1962）是二等与其它等对立的唯一标志，那末，二等与声母卷舌化之间的关系便不可理解。因此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设：

二等区别于其他等的标志可以解释为卷舌化。这是指二等有特殊的卷舌元音（标作 Ψ ），这些卷舌元音造成了所有二等舌尖类辅音中和为相应的卷舌音^⑧。韵图的作者也认为声母的卷舌化是二等的标志，因此，他们把所有带卷舌声母的音节，即便事实上属于三等韵的卷舌声母音节都统统列在二等。关于二等韵母有卷舌元音的推测，刚好跟中古二等音节的上古原型带*r介音的假设是一致的。

三等问题较为复杂些。任何研究者都没有怀疑过3等和4^a等韵母各有某个i类型介音。其根据是，现代方言里（粤语除外）来源于中古3等和4^a等韵母的韵母事实上都带腭介音。但是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早期梵语译音没有显示出跟中古三等腭介音有任何对应关系这一事实。

我们考察了三等韵母在朝、日、越语中的对音（这些语言的对音系统很重要，因为正是通过它们才划定了3等和4^a等之间的区别）。汉朝语系统尤其能说明问题。不管是腭介音还是央介音（i或ɨ）朝语都有表现的手段。但是，如果说我们在4^a等韵母的对音里经常看到有介音i，那末3等韵母的对音里好像没有介音（只有宵>朝语-io是例外）。在汉日语（吴音）和汉越语里，3等和4^a等韵母的对音里一般都没有介音^⑧，而3等和4^a等之间的区别在于：

（1）汉日语4^a等对音的元音较靠前（比较：真韵3等对音-on，4^a等对音-in等等）。

（2）汉越语3等和4^a等唇音声母有不同的演变。4^a等唇音有规律地变为齿音，而三等则保留唇音的性质。比较，辩（北京 bian，仙韵3等）>越南语 bien，而鞭（北京 bian，仙韵4^a等）>越南语 tien 等等。